

# 证词录像的再现与真实<sup>\*</sup>

——杰弗里·哈特曼与大屠杀文化研究

王 凤

**【提 要】**20世纪80年代后,杰弗里·哈特曼更多地关注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在主张赋予审美以其应有的尊严的同时,也反对文学研究对社会学的过度忽视。因此,他以大屠杀研究为突破口,将维护艺术自身形式要素特征和杜绝艺术麻痹不仁的防御姿态结合起来,选择了证词录像作为再现大屠杀历史的方式。作为一种证词文学,或者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文学叙事,证词录像既克服了实证主义史学家所称的客观真实,又克服了现代媒体文化带来的思维和精神惰性,以艺术的真实和想象唤起大众对外在世界的强烈感受,从而实现了其独特的述行功能。

**【关键词】**证词录像 再现 大屠杀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4)06-0115-06

##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之前,哈特曼主要以杰出的浪漫主义研究者、充满解构哲学意味的多元阐释的提倡者,以及创造性批评的大力阐发者身份出现在文学研究领域,被冠之以“古典的哈特曼”(classical Hartman)<sup>①</sup>。从80年代中后期起,大屠杀问题逐渐成为哈特曼学术视野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其犹太人身份在某种意义上加强了他对该问题的敏感意识。他一方面对真实、再现、记忆等与大众媒体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进行思索,一方面进行大屠杀录像档案的组建、筹备、录制工作。从1981年起,哈特曼就开始着手建立“耶鲁大学福特那夫大屠杀证词录像档案”(Fortunoff 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y at Yale University),在美国、英国、

法国、比利时、德国、希腊、南斯拉夫、以色列、斯洛维尼亚、阿根廷等国家大屠杀幸存者 and 见证者进行证词录像,引起了很大反响。随后,哈特曼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大屠杀文化问题的著作和论文,以文学研究者身份来看待现代媒体文化中历史与叙事、真实与再现等命题,对创伤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sup>\*</sup> 本研究为国家社科(西部项目)“当代西方文论范式转换中的文学性研究”(14XXW001),重庆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文学性’问题研究”(2013SKZ1301),重庆邮电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项目“文学性”问题研究(K2012-02)的阶段成果。

<sup>①</sup> Geoffrey Galt Harpham. Once Again: Geoffrey Hartman on Culture. *Raritan: A Quarterly Review*, 1998, 2(18), pp. 146-166.

## 二、大屠杀文化研究转向

正如尼古拉斯·特雷德尔(Nicolas Tredell)所称,对于英美文学研究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一场充满危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关键的10年。<sup>①</sup>在此期间,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研究面临着挑战,这种挑战使人们在60年代以后形成的关于文学研究的概念、方式以及界限等因素得到重新审视、突破和拓展。当然,特雷德尔所称的文学研究危机,实则是文学研究的对象从文学文本向文化文本的泛化现象,也就是文学研究的再度历史化与社会化。

如果说文化研究的兴起构成哈特曼转向大屠杀研究的外在动因,那么,对真实的寻求以及对记忆问题的关注则是这种转向的内在动因。本雅明和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关于艺术复制和类像(simulacra)的理论对哈特曼产生了较大影响,尤其是后者。鲍德里亚否认一切真实的存在。现代社会无所不在的形象文化并不反映现实,反而会掩饰与歪曲基本现实,甚至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进入纯粹是自身的类像领域,使得真实在超真实中逐步瓦解陷落。因而,人们所经验或感受到的是一种非真实的世界。既然没有了现实,一切都是类像所产生的虚幻,那么符号就没有了现实对等物,其指涉价值被完全否定。由此,再现(representation)也就随之变得不可能,甚至至于被视为是类像自身。

对此,哈特曼基本持认同态度。现代社会中,媒体高度发达,导致了人们难以分辨或无以分辨什么是现实或真实的境地,这意味着人们对媒体传递的内容进行真实检测的能力已大大削弱。但是,与鲍德里亚对大众文化的精义分析得出的悲观历史终结论,及由此采取的与大众文化的决裂态度(尽管这种决裂是虚拟的)不同,哈特曼对影像文化进行了更为积极的思考,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在他看来,尽管类似大屠杀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曾重复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只能任由噩梦缠身而无以摆脱,关键在于,人们以一种怎样的方式来呈

现这种历史事件。换言之,一方面,历史的真实性不容抹杀。另一方面,人类的主体能动性并没有被现代媒体文化抹除,人类记忆在唤醒历经文化沉淀的历史事件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哈特曼对再现大屠杀历史问题的关注,对真实的追寻,对记忆的执着,表明了他仍然相信真实、现实的存在,如他所言,“那些被列入业已消失不见的事物名单上的东西事实上可能并没有消失”。<sup>②</sup>如果说,鲍德里亚对大众媒体文化的批判致使其失去对人类历史和未来的信心,那么,哈特曼则以一个对文学持永恒信念的文学批评家身份,保持着对人类的绝对信心。他将文学的特殊性存在视为抵制文化研究吞噬文学批评的屏障,“我们应该恢复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对文化进行思考的形式这一特性,且用这种形式不仅可以抵制其时代的,也可以抵制最近的实证主义”。<sup>③</sup>

哈特曼对大屠杀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非学术到文学研究的转变过程。在他看来,人们必须以一种恰当的方式,唤醒那些被大屠杀幸存者和见证者尘封在心底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噩梦般的记忆,以便“人性的意义必须得以恢复”。<sup>④</sup>在再现人们对大屠杀事件的记忆经验的模式中,历史编撰、传记、自传、小说、电视剧、电影都没有成为哈特曼的首选。一方面,如上所述,哈特曼相信历史和真实的存在。另一方面,这种真正存在过的历史,需要一种可对抗不真实的模式再现出来。在一切深度和界限都消弭的后现代文化中,有什么可以使人们相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悲剧曾经真正发生过,而且这种悲剧为人们带来的痛苦和阴影始终未曾远离过?换言之,有什么方式可以防止这种痛苦被文化

① Nicolas Tredell. *The Critical Decade: Culture in Crisis*. Manchester: Carcanet Press Limited, 1993.

② Geoffrey H. Hartman. *The Fate of Reading Once More*. PMLA, 1996, 3 (111). pp. 383-389.

③ Geoffrey H. Hartman. *The Fate of Reading Once More*. PMLA, 1996, 3 (111). pp. 383-389.

④ Geoffrey H.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挪用，被政治篡改，最终成为麻痹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虽没有像鲍德里亚那样在体制内激烈地进行反体制的斗争，但哈特曼谨慎的言行中，也透露出其对虚伪文化与政治的不满，“我们不能从发生该事件的世界中转身离去，但有许多事物妨碍着我们的焦点，且这一问题因现代媒体及其现实主义和再现范围而变得更加复杂”。<sup>①</sup>

### 三、再现与真实

如果说大屠杀构成一种集体性的创伤事件，关于大屠杀的证词录像属于一种创伤叙事，而创伤叙事一般具有历史表现、文化表现和文学表现几种主要形式，那么，哈特曼选择了证词录像这一较为特殊的形式。之所以特殊，是因为这种再现方式集历史、文化和文学于一身，体现了哈特曼对真实及其再现的独特理解。

受阿多诺、海登·怀特、利奥塔、马尔库塞等思想家的影响，哈特曼对于历史反应真实的观点持怀疑态度。首先，受阿多诺的影响，哈特曼认为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亦即他所谓的“官方历史”（official history）。在哈特曼看来，这种历史也是对过去的一种记忆，但却是一种政治化的记忆，它逃避人性和阐释的复杂性，将意识形态内容渗透到每一事物中，并且声称能够以纯粹的眼光看待过去，从而具有一种救赎的力量。哈特曼将这种官方历史视为由国家意识形态机器操纵的结果，“它操纵记忆如同操纵新闻一样”。<sup>②</sup> 其次，既然历史是意识形态操纵的结果，那么，它就是一种服务于官方政治的历史叙事，失去了自己所声称的客观性，因而决非历史真实。再次，为寻求一种总体性的、一致性的、纯粹的客观再现，达到其意识形态化的目的，这种官方的历史叙事不仅试图简化历史，而且也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决定性的视角来简化民间传说、诗歌等传统拥有的鲜活的公共记忆。简化的结果，必然是对历史的篡改或重新形象化，公共记忆被轻易欺骗，官方历史构成了公共记忆的最大威胁。最

后，在媒体文化盛行的电子时代，思想的自由市场往往使官方历史受到学界或媒体新闻的争论。

在质疑历史所谓客观事实性的同时，哈特曼也质疑媒体文化呈现极端事件时具有的欺骗性的真实。人们本来就对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大屠杀缺乏清楚而真正的认识，而现代媒体的高效性及再现模式更加模糊而不是澄清了这种认识。哈特曼在本雅明、鲍德里亚等对消费社会中媒体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推进了一步。他认为，正是因为人们已经意识到媒体形象只是一种摹本或类像，与真实或现实无关，所以媒体文化所谓的真实性已经达不到它期望产生的效果。这造成了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方面，人们对媒体产生了不信任感，认识到媒体对所有灾难事件的报道都是经过处理的，都具有一种阐释背景，因此，电视上的图像仅仅是图像而已，与真实毫不相干。这就使人们的反应系统产生了一种抗体，防止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任何干扰，即哈特曼所说的大众媒体的“去感觉化”（desensitize）。这一趋势必然导致人们对外在世界产生反应力的门槛提高，即反应灵敏性降低，致使人们成为暴力和侵犯行为的冷眼旁观者。另一方面，媒体可谓无所不能见，无所不能听，它将恐怖事件以事实如此这般地传递出来，使之成为一种貌似自然而非人为的灾难。但是，这种对真实的追求反而将人们与被感知的现实隔离开来，在两者之间制造了距离。换言之，即时性的形象不但没有让人们产生真实感，反而让他们觉得，屏幕上的东西只是一种有趣的建构或模仿，都不是真实的。这种揭示真相的方式及其提供的证据，无论是语言的、图片的，或影像的，都受到了怀疑：人们担心，表象的世界和宣传的世界通过媒体的力量结合起来掩盖事实的真相。哈特曼认为，艺术

<sup>①</sup> Geoffrey H.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sup>②</sup> Geoffrey H. Hartman. *The Longest Shadow: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Holocaus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1996.

是历史性与想象力的完美结合。这意味着艺术的真实既包含历史的真实,也包含想象的真实,而后者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实。这种艺术的真实不会让受到现代文化启蒙的人认为,历史因受意识形态操纵而成为官方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政治化话语,也不会让他们面对影视媒体时对现实产生不信任的感觉,从而克服了历史事实和媒体真实造成的“真实的不真实”(the real unreal)。<sup>①</sup>那么,艺术的再现模式,尤其是文学,在克服现代媒体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思维和精神惰性、唤起他们对外在世界的强烈感受方面,起到了其他再现模式无可比拟的作用。这种作用,也就是哈特曼在建立大屠杀档案馆过程中,一直努力倡导的艺术独特的述行功能(performative)。它能促使人们克服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相互疏离。正是在这点上,一贯发挥着缩短距离与沟通感情功能的艺术找到了其价值。

对于大屠杀这段人类历史上人性最为黑暗的时期而言,对它的艺术再现意味着不仅要使人们知道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产生一种反应,一种既对于非人性也对于人性的反应,并让这种反应能够重新赋予集体记忆以想象力,创造一种现代性状况下的集体记忆再现模式,如哈特曼所称,“对于一场被迫害人数如此之多且造成的生命危害和精神错乱如此严重的大灾难,如果试图以小说来传播,必然会遭遇人们的一种保留看法,小说的力量能否可以避免一种伪造、篡改事件的风格吗?在我们的时代,通过纯粹世俗的方式,是否能够既保存灾难又保存人性真相,即以比历史学家的记忆努力更有效的方式来传播它呢?”<sup>②</sup>因此,哈特曼选择了证词录像这一既体现口述传统又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叙述模式。这种结合产生了小说或传记(包括自传)等其他文学再现模式所不可比拟的即时性与真实性,且又使得不在场的记忆通过观看者即读者的想象力成为在场。

#### 四、作为文学叙事的证词录像

从认知角度探讨创伤事件,会存在一种对

创伤事件寻求终极解释的倾向,因为认知研究试图通过创伤事件,在其底部或背后找到一种生物的或元心理的机制。这样,就势必忽略人性中固有的激情、痛苦、亲情等情感因素。与之相反,从文学的角度来研究,目的不在为创伤提供确切的答案或治疗方案,因为文学研究并非寻求一种关于过去的知识,它以一种否定的方式,关注着言语中的不在场或间断、语言的修辞性、声音与身份的关系等问题。换言之,证词录像作为一种见证行为的文学,或证词文学,允许阐释的多样性,“以一种非科学的、与总体性现实主义或分析性再现形式不相一致的形式传递着知识”。<sup>③</sup>这种阐释模式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其文学叙事特征。

首先,这些证词录像不仅仅用以统计和证明受到迫害和种族屠杀的死亡数字,而且用以探索人类自身的生活故事。因此,在这种具有强烈重负感的叙事中,“叙述与浓缩了的想象之间自发产生了一种关系”。<sup>④</sup>

其次,证词录像以文学语言重构历史。在证词录像中,幸存者和见证人并非通过一个非个人的或显得非常中立的叙述者进行讲述,而是用自己的声音说话,他针对在场的而非影子般的听者自我呈现,更具有复原性作用。那么,不同个人对同一事件进行不同视角的叙述,可以更为有效地达到重构那段历史的目的。在这种叙述中,叙述者不仅是生活在目前的对往事的叙述者,而且也是叙事中的一个人物,存在于被描述的文本中。这就是巴特所说的一种不及物写作(intransitive writing),即一种作者与文本之间距离为零的直接表达,作者就在文本之中,没有超然于文本之外。贝纳尔·兰(Ber-

① Geoffrey Hartman. *Scars of the Spirit: The Struggle against Inauthentic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② Geoffrey H. Hartman.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 3 (26), pp. 537-563.

③ Geoffrey H. Hartman.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 3 (26), pp. 537-563.

④ Geoffrey H. Hartman. *The Humanities of Testimony: An Introduction*. *Poetics Today*. 2006, 2 (27), pp. 249-260.

el Lang)认为,这种不及物写作是一种非个人化表述,从而将它与文学想象对立起来。<sup>①</sup>哈特曼的观点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他将证词视为一种个人性的文学叙事,或者是一种对记忆的文学建构。一般而言,对创伤的认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创伤事件,二是创伤记忆。如果说前者是最初的遭遇,是真实的、确定的,对应于文学文本的字面意义的话,那么,后者则对应于文学中的比喻意义或修辞意义。因为创伤经历者受到震惊无法对创伤事件真正理解,在经历与理解之间就产生了脱节。这种脱节恰恰是修辞性语言加以表达和探索的领域,所以“任何模式的创伤记忆再现都冒着自身成为修辞性语言的危险”。<sup>②</sup>

如果说语言的修辞性造成了语言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对应关系的消失,最后剩下的只是能指符号的相互替换这一否定性特征,那么也就不存在单一的、本真的意义,从而导致阐释的必要。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哈特曼将幸存者和见证者对于创伤事件的口述既看作是一种文学,也看作是一种阐释。他认为,当这些幸存者和见证人说“我看见”或“我明白”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文学的方式,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明白。<sup>③</sup>

再次,证词录像体现出主观真实性。证词录像中的幸存者和见证人,在大屠杀事件发生近半个世纪以后进行回忆描述,时代的久远与认知的限制(当时出于震惊,对所发生的事件无法理解),证词的个人性和主观性,都不可避免使他们的记忆变形或发生扭曲,存在对历史真相歪曲的可能性,尤其对一些涉及到日期、姓名、事件顺序等需要实证的东西时有所疏漏,这一点是无可辩驳的。但是,同样无可辩驳的是,证词录像表现的是当事人在现在时刻对过去事件的现实感受。这种毫无掩饰的、直接口述的记忆给观看者以绝对真实的感觉,这种真实不在于其与几十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完全吻合,而在于幸存者和见证人通过记忆的想象,自然流露出来的直接感受和表达出来的真实情感。同时,每一段证词都将听者和观众置于记忆的在场中,直接感受幸存者和见证人对其经

历的最原初印象,感受其受到的影响,从而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直接的情感效果,使听者与观众的内心与灵魂都为之所动。相形之下,他们的证词是否与过去历史事件完全吻合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正是在此意义上,哈特曼认为,证词录像就像柯勒律治的名诗《古舟子咏》一样,要求读者“对不信任进行悬置”(a suspension of disbelief)。<sup>④</sup>在大屠杀中,受害者遭受的巨大恐惧无法被外界相信,甚至对受害者本人来说也不可置信,因为自己被置入一种没有希望的境地。所以,暴行使得反应几乎不可能。只有当受害者或听见有关这种暴行话语的人能够相信它确实发生过,并且相信可能再度发生,当他们认为这种暴行还没有否决自己关于人的观念,或使自己产生去人性化思想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反应。

最后,证词录像催生个体反应性。在诗歌创作中,华兹华斯对游走的小贩、无家可归的妇女、贫困的牧羊人、瞎眼的乞丐、野性的男孩、疯癫的母亲、采石场的跛子、瘫痪的男人等所有在旅途中不期而遇的个人,都表现出极大的反应力和热情。华兹华斯这种敢于感觉,敢于移情于与自己迥异之人,并对之产生反应的能力,让哈特曼深刻认识到,证词文学本身具有扩大、加深人们对极端事件的敏感性和意识的作用。高度个人化的证词虽然是对人类共性的诉求,但这种共性并非意味着一致性。证词录像的幸存者和见证人来自非精英阶层,多数由于战争、经济状况恶劣被剥夺了受正规教育的机会,所以,他们代表着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成为官方历史中被遗忘的群体。作为战争的巨大

① 参见 Berel Lang. *Act and Idea in Nazi Genocid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② Geoffrey H. Hartman.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 3 (26), pp. 537-563.

③ Geoffrey H. Hartman. *On Traumatic Knowledge and Literary Studies*. *New Literary History*, 1995, 3 (26), pp. 537-563.

④ 参见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Biographia Literaria; or Biographical Sketches of my Literary Life and Opinions* (Vol. 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受害者，他们的身份认同意识遭遇破裂，且破裂程度如此之深，乃至需要自我接受。因此，他们每个人的每段叙述，除针对在场的观者或听众外，还针对另外一个不那么明确但很必需的内在的他者。这个“他者”，本质上是一个讲述者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听者兼心灵伙伴。即使在自由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幸存者在精神上仍然处于囚禁状态，没有从过去巨大的黑暗阴影中走出来，但这种状况自己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如此，每个幸存者兼口述者同时扮演了三种角色：故事叙述者、故事人物以及故事倾听者。这种多重角色给人带来的真实性，以及这种真实性引起的复杂反应，甚至伴随这种反应而生的想象力，都是其他再现模式不可比拟的。

## 五、结语

对哈特曼而言，虽然以大屠杀为题材的小说和历史也许令读者感觉像近距离的观察者，甚至产生移情作用，但是非现实的小说的方式和实证的历史的方式都无法有效地涵盖大屠杀

事件的复杂程度，所以，他选择了幸存者和见证人的证词录像这一更具个体化和平民化的世俗方式。除了这种再现方式本身涉及的人物较为广泛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给人带来的文学录像是一种现代技术支撑下的文学语言表述方式，但是这种表述同时承担着传承文化、做出智性承诺以及履行道德义务等多重使命。

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大屠杀的研究并没有让哈特曼感到满意。这些研究，无论从施害者抑或受害者角度，只是让人们窥见了潜伏于人性深处的极度阴暗和凶残，且存在被文化挪作他用的危险。哈特曼期望通过自己的研究，发现更多的人性之光，使其成为道德上与政治上的有效借鉴。

本文作者：重庆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责任编辑：马光

## Representation and Authenticity of Video Testimony:

### Geoffrey Hartman on Holocaust Studies

Wang Feng

**Abstract:** Geoffrey Hartman has been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the social func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by exploring the Holocaust since 1980s. He makes great efforts at an effective representation that both maintain the artfulness and prevents inertia in mind caused by the aesthetic distance. As a result, he decides upon the video testimony as a way to represent the Holocaust. As a narrative mode, the video testimony overcomes not only the objective reality alleged valid and legal by historian positivist, but also the irresponsiveness or less responsiveness brought about by modern media culture. By appealing to the spectators with its artistic reality, it enables them to struggle out of the desensitized state and respond enthusiastically to the outside world.

**Keywords:** video testimony; representation; Holocaust